

● 毛泽东哲学

毛泽东教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分子”

*——兼谈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

韦 日 平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韦日平(1963-),男,广西上林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广西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

[摘 要] 从教育哲学的视野看,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辩证关系的层面,把教育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之一,高度评价和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的重任赋予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建国后,他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论述,包含了错误的判断和看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否定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错误判断,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

[关键词] 毛泽东;教育哲学;知识分子;邓小平

[中图分类号] B 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4-0456-05

在毛泽东的教育哲学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不论是论述教育的本质、目的,还是分析教育的价值、教育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我们都经常看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概念的运用。从教育哲学的视野来看,毛泽东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辩证关系的层面,把教育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一种,高度评价和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把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的重任赋予知识分子,这一方面的思想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从克服旧教育体脑分离的缺陷出发,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这一口号除了体现知识分子要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合理性外,却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思想状况的不正确的判断,致使这一口号成为后来的“教育革命”的依据之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通过纠正和否定毛泽东晚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错误判断和政策,在新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

一、教育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教育哲学的角度看,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为依据,把教育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之一,从教育和特定的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

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 (第663-664页)。这段论述可以看成毛泽东教育哲学的基本观点。教育作为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地传播知识的行动,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而知识分子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加工者和传播者,他们的作用正是通过文化(含教育)与特定的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表现出来的。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知识分子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加工者和传播者,其作用首先表现在为特定的政治、经济服务。其次,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积极有为的教育工作对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建设起到引导、推动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变革,大体上是沿着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而逐步深入的。随着层面的深入,知识分子的服务作用、影响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在鸦片战争之后,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教育主张,从器物层面指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选择;继后,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则指出器物表面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改革的必要性。在他们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基础上,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完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制度变革。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未能实现中国人民文化精神上的根本变革。此后,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引进西方民主、科学精神,对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礼教思想进行激烈的批判;与此同时,在教育方面,他们致力于对中西教育的比较,把教育改造作为国民性改造的措施,主张在教育中以树立个性独立为宗旨,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目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充分肯定,把他们称为“先进的中国人”,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过论述:“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 (第1469页)。

对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仍然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辩证关系中予以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他认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接受,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知识分子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深刻地指出:“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的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斗争中,他们将起到更大的作用”^[3] (第108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也一再告诫全党,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取知识分子参加,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4] (第19页),反复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更好地团结他们。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重要依靠力量的观点,发生了动摇和倒退,视广大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挫丧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二、“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与知识分子的任务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总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辩证关系中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任务予以论述,反对抽象地谈论知识分子的作用及任务。他指出: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3] (第1083页)。这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任务的最高概括。这一概括虽然是就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而提出,但时至今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仍是我们的任务。

教育的民族化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大任务。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的民族性体现在教育的目的上要培养具有民族尊严、爱国建国的人才,表现在教育价值上是教育要倡导为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利

益的价值观,表现在教育内容上则是教育内容的选择性。毛泽东特别重视教育的民族化的问题。他指出:所谓民族的,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第706页)。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的优秀部分,必须在我们的教育中得到传承和弘扬,决不能言必称希腊,数典忘祖。他在1938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遗产”^[2](第533-534页)。当然,毛泽东主张教育的民族性,与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存在根本的区别。他认为,在教育中注意民族特色必须与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对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进步文化,应持积极汲取的开放态度,经过对它们进行有批判、有分析的汲取,达到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科学化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对知识分子提出的第二个任务。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作为教育者,必须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弘扬科学的精神。从教育哲学的视野看,“科学的”新教育包括以下内涵:其一,知识分子本身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其二,知识分子应培养被教育者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的观念,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即使是对历史上正确的理论或外国传进来的先进的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应迷信,不应当把它当做教条,而应该把它们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其三,在教育过程中注重自然科学等现代科技知识的传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学校不应光教四书五经之类的圣言,还应教给学生一些经世致用的实用技术,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调整教学内容,让学生跟上科学发展的潮流。其四,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很注意教学方法的科学化,他认为科学的教学方法能调动学生的自觉能动性。他反对教师对学生的“满堂灌”。早在1929年,他就提出了启发式教学的10项要求,即:(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些方法虽极为通俗,但它作为教学方法的科学探索,对我们今天进行素质教育仍有启迪作用。

坚持教育的大众化,是知识分子的第三大任务。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教育与一切旧教育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新教育是为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可以享受的。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通过革命斗争去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改变由少数人控制教育权的问题。人民大众掌握了教育权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大众仍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普及教育。因此,知识分子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地把教育视为为大众服务的工具,绝不能把教育视为手中的特权而看不起民众。他曾就抗日战争中的文化工作的大众化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3](第708页)。毛泽东不仅倡导大众化的教育哲学理念,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他创办了农民夜校、湖南自修大学、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土地革命战争中,他提出苏维埃的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5](第8页)。

此外,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在教育中的任务时,还提出了知识分子作为教育者,其本身必须首先受教育的问题。这一点从教育哲学的角度看是正确的。因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互相作用的。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痼疾,即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广大劳动人民,以培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治求人才为宗旨的教育制度提出来的。因此,把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衡量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惟一标准,是符合当时革命实际要求的。毛泽东一贯认为,对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又要教育改造。所以,在建国后,把“团结、教育、改造”作为

党和政府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规定这种方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56年之后,在党的政治路线向“左”倾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政治口号,就不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因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不论是政治立场上,还是世界观方面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失误,仍以“劳动化”、“是否与工农相结合”作为衡量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惟一标准,而且把“与工农相结合”简单地归结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劳动”简单化。结果,既造成不能使知识分子的专长得到发挥,又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三、邓小平对毛泽东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

从前面三部分的分析中可知,毛泽东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任务的论述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他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论述,除了包含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妥当乃至错误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开拓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的观点,为发展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理论做出了贡献。

(一)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逐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不时地将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接受的教育、某些思想表现等同他们的阶级属性混淆起来。1957年3月,毛泽东认为我国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4]第(409页)。翌年3月,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还存在的两个剥削阶级之一,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领域革命的对象。直至“文化大革命”进而把知识分子看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这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严重偏差。

邓小平认为,建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9]第(89页)。邓小平这一论断,不仅恢复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关于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动群众”的正确思想,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邓小平的正确论断,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而解除了长期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

(二)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作出了科学的论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认为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并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消灭了,但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故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本来,历史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不仅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但毛泽东却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使知识分子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

1977年8月,邓小平就我国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问题作了科学的精辟的论述,即肯定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所取得的成绩,又鼓励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世界观的转变方面有很大进步,拂去了长期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阴影,明确知识分子不再是思想改造的惟一对象,改造的目的不仅局限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且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去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以便更好地担负起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更为重要的

是,邓小平提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代替“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从而激励知识分子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思想理论素质、确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增长科学文化水平的积极性。

(三)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方针。基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基本判断,以及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特殊作用,邓小平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邓小平还充分论述了造就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上的国际竞争,其核心是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因此,要抓紧建立“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9](第 91 页)。同时,还要培养一大批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理论家及各种专业人才。邓小平十分强调要充分发挥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作用,要重视中年知识分子,使之担负起承前启后的重担;要大力培养和选拔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造就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为制定“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奠定最基本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5] 毛泽东. 毛泽东论教育工作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严 真)

MAO Ze-dong's *Intellectuals* in Hi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WEI Ri-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EI Ri-ping (196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O Ze-dong's thoughts and DENG Xiao-ping's theories.

Abstract: From the visual field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MAO Ze-dong had gains and loses in the discussion of *Intellectuals*.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he considered education a kind of culture in ideology, highly appraise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and entrusted them with the task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opular new cultures and new education, which is instructive till today.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his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integrate with the working people* had some sense, it also contained mistaken ingredient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DENG Xiao-ping not only corrected MAO's later years' mistaken judgment, but also developed his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to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MAO Ze-dong;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tellectuals; DENG Xiao-ping